

沈从文、汪曾祺、曹乃谦可成一脉，但曹乃谦最弱，因其根基只在民间传统，而沈从文与汪曾祺除民间传统之外，又有文人情怀与趣味，故其二人面向更为丰富。

汪曾祺对沈从文的推崇几十年如一日，其成就由此可见，其局限大致亦能由此见出。沈从文亦是继承了《社戏》《故乡》的鲁迅，只是在这一路上，他比鲁迅走得更远，所写的佳作更多。沈从文是汪曾祺之师，汪曾祺自觉地学习沈从文，且在西南联大授业于沈从文之门，新中国成立之后二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，有过共患难的朋友。沈从文对汪曾祺极好，他很早就发现了汪曾祺的写作才华，曾对别人说，汪曾祺的文章比他好。汪曾祺的课堂习作，沈从文曾给过120分。

沈从文之浮沉与汪曾祺颇近，由有名而无名，再至于有名，沈从文靠一支笔在民国时就已从“北漂”成为作家，1949年之后受到压抑，之后转行作服饰研究，竟然成绩卓著，在1980年代，沈从文仿佛出土的文物，忽然在海内外大热。

汪曾祺写过十几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，可谓不遗余力，可见他对沈先生作品之推崇，对其感情之深厚。这些文章包括：《沈从文和他的〈边城〉》（全集第三卷）、《沈从文的寂寞》（全集第三卷）、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（全集第三卷）、《一个爱国的作家》（全集第四卷）、《星斗其人，赤子其人》（全集第四卷）、《沈从文转业之谜》（全集第四卷）、《〈沈从文传〉序》（全集第四卷）、《读〈萧萧〉》（全集第五卷）、《又读〈边城〉》（全集第五卷）、《中学生文学精读〈沈从文〉》（全集第六卷）、《梦见沈从文先生》（全集第六卷）、《与友人谈沈从文》（全集第六卷）等；另外在文章中、言谈中提及沈从文处更是数不胜数。

汪曾祺谈沈从文的文章大致分为三类：一是评介其作品，譬如《沈从文和他的〈边城〉》《又读〈边城〉》《读〈萧萧〉》《沈从文的寂寞》《一个爱国的作家》《中学生文学精读〈沈从文〉》等；二是介绍沈从文其人其事，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、《沈从文转业之谜》等；三是怀念与追忆，譬如《梦见沈从文先生》等。

在《沈从文和他的〈边城〉》中，汪曾祺言及《边城》好处及为什么好，不厌其烦，亦因他与沈从文关系密切，还说出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，譬如翠翠原型出乎何处，譬如沈从文上课时强调“要贴着人物写”、“要耐烦”等，这些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从文的精神。《又读〈边城〉》借金介甫之口道：“可以设想，非西方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，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：把沈从文和福楼拜、斯特恩、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。”这篇文章除了再度评价《边城》好处外，还回应了两种对《边城》的批评意见：一、其中没有阶级斗争，二、不是现实主义。《读〈萧萧〉》极言小说之好，汪曾祺先从萧萧之名论起，再言故

所推崇的长辈与所提携的后辈

——汪曾祺与沈从文和曹乃谦

□刘 涛

事、风景、词句，又言及女学生，由此或可见沈从文对启蒙的态度。《沈从文的寂寞》副标题为《浅谈他的散文》，这是一篇大文章，对沈从文的诸多断语与论述极到位。汪曾祺说：“可以说，寂寞造就了沈从文。寂寞有助于深思，有助于想象。……安于寂寞是一种美德。寂寞的人是充实的。”又说：“仁者寿。因为这种抒情气质，从不大计较个人得失荣辱，沈先生才能经受了各种打击磨难，依旧还好好地活了下来。80岁了，还是精力充沛，兴致勃勃。他后来‘改行’搞文物研究，乐此不疲，每日孜孜，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，也跟诗人气质有关。他搞的那些东西，陶器、漆器、丝绸、服饰，都是物，但是他看到的是人，人的聪明，人的创造，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。……他搞的文物工作，真想给他起一个名字，叫做‘抒情考古学’。”汪曾祺论沈从文这段话，朴素直白，但胜过诸多刺刺不休的、面目可憎的研究论文，此可谓知音之言，道出了沈从文的心声与志向，亦可视为汪曾祺夫子之道，他所走的文学之路也可谓抒情。《一个爱国的作家》回应了几种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批评，盛赞沈从文是爱国作家，其作品有大的志向：致力于“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”。《中学生文学精读〈沈从文〉》则是向中学生介绍了沈从文的基本情况、文学风格与文学上的贡献，题解、赏析了《边城》《牛》《丈夫》等作品。

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是极佳之作，汪曾祺散淡的风格适于描写沈从文。汪曾祺回忆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授课情况，课堂内外皆有妙趣，写了他的行状、心境、所秉持的文学观念、藏书、对学生的态度等。小说家进入大学课堂，历来备受争议，坊间流传刘文典曾批评沈从文不必躲避飞机轰炸道，“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，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民族希望，你一个写小说的跑什么”，此或能见出彼时部分学者对沈从文的态度。在这样的压力下，沈从文或许只有通过努力与成绩作答复吧。尼采说，三件小事可以见出一个人。汪曾祺所写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跃然纸上，沈先生其人整体也可由此见出，诚如汪曾祺所言，沈从文本身就是极好的作品。除此之外，亦能见出西南联大彼时的风气和情况。《星斗其人，赤子其人》介绍了沈从文少年时期、西南联大时期、老年之际的情况，记录了他

的生前身事后事，写了他写作情况，对书法、瓷器、服饰等之兴趣，很多都是根据汪曾祺耳闻、目睹、身历记录下来，一方面可以丰富沈从文的形象，另一方面亦可以存留文坛掌故。汪曾祺说：“沈从文一生分成了两截。1949年以前他是作家，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；1949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，写了一些关于文物的书，其中最重大的一本是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”《沈从文转业之谜》即是解释沈从文转业的原因，由此能见出1949年之后沈从文所面临的压力、困境与心态，他转业乃是“逼上梁山”。

《梦见沈从文先生》记录了汪曾祺的一个梦，他梦见读沈从文的小说，且为之校改，并与沈从文谈话，彼时汪曾祺77岁。做梦者梦见了谁，梦见了什么大概能够见其大体，譬如孔子梦周公，因心仪久之，慕其功业，有继承之志，故行之于梦中。汪曾祺梦沈从文，此是承续之象。

对于晚辈，汪曾祺颇喜欢很多人的作品，譬如铁凝，他曾写过《铁凝印象》。此文把铁凝写得活灵活现，对她的作品评价也很高：“河北省作家当得起清新二字的，我看只有两个人，一是孙犁，一是铁凝。”另外，汪曾祺喜欢曹乃谦，他对曹乃谦的写作有极大的鼓励与帮助，可以说汪曾祺是曹乃谦的伯乐。

曹乃谦，1949年出生，属于红卫兵知青一代，经历坎坷。曹乃谦本名不见经传，他是山西的警察，不在文学圈内，但由于两个人的推动，他在文学上的价值也被广泛认可，一是汪曾祺，二是马悦然，他翻译了曹乃谦的《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》，并写长文推介。曹乃谦《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》确是非常优秀的作品，其题材与风格自成一格，小说写出了真实的农村。新世纪以来，描写农村的小说约有三类。第一类是“三农问题”或“底层文学”视野下的农村，这一类强调了农村的问题：阶级分化、矛盾冲突等，偏于阴，譬如《中国农民调查》《生死十日谈》等。第二类极写农村之美，譬如韩少功《山南水北》，在他笔下的农村是和谐的，充满了山水田园之趣，农村有隐逸的高人，年轻作家则以湖南的马笑泉为代表，其《巫地传说》可谓代表。第三类则是曹乃谦《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》所呈现出来的农村景象，这一类介乎第一类与第二类之间，他笔下的农村尽管有贫穷、艰难的一面，

但也有极美的一面，曹乃谦笔下的诸多人物充满着光辉，读之几乎让人泪下。

曹乃谦37岁时，因与朋友打赌，开始写小说，孰料出手即不同凡响。曹乃谦自述与汪曾祺结识渊源道：“这又得说到我打赌写小说的事儿了。赌了两篇，我都发表在大同的《云冈》上，朋友说《云冈》我一定是有熟人，他让我往北京上来一篇才算本事。我说来就来。于是我就动手写第三篇。小说写好了，打听到《北京文学》杂志社办的创作班就要来大同开笔会，真也是巧。更巧的是，他们也请了汪老。于是汪老就见到了我的这个稿子。汪老看了这部小说后，问我以前发表过没有，我就把发在《云冈》上的那两篇都给了他。第二天他给了我一本《晚翠文谈》，是他谈创作的书。1991年他就介绍我入了中国作协，当时我总共才发了有十来个短篇，属于被破例。他说不在多少，有的虽然是一本又一本本地出，可那就像大野地响了几个小鞭炮。你一个短篇就赛过有的人的一个本。他对我的鼓励、扶持、培植让我感激不尽。”谈到汪曾祺的作品，曹乃谦说：“汪老的作品我都喜欢看。他的《看水》《大淖记事》《七星茶坊》《求雨》《尾巴》，当然还有《受戒》。小说化的散文，散文化的小说。我的有些作品也是这样，这一点准是受了他的影响。”（曹乃谦、何立伟：《怀念老头儿汪曾祺》）汪曾祺、曹乃谦的小说皆有散文化的倾向，此为二者共同处，故二人可有交集。

曹乃谦与汪曾祺初见之时，曹乃谦小卒，汪则是文坛前辈，他礼贤下士，对后辈的提携确实让人感慨。汪曾祺曾写过一篇《〈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〉读后感》（全集第四回）。开篇汪曾祺即开宗明义说：“一口气看完了，脱口说：‘好’。”汪曾祺评论内容道：“作者对这样的生活既未作为奇风异俗来着意渲染，没有作轻浮的调侃，也没有粉饰，只是恰如其分地作如实地叙述，而如实的叙事中抑制着悲痛。”评论小说的形式道：“小说的形式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朴素，一般意义上的单纯，简直就是简单。像北方过年庙会上卖的泥人一样的简单。形体不成比例，着色不均匀，但在似乎草率率画出的眉眼间自有一种天真的意趣，比无锡的制作得过于精致的泥人要强，比塑料制成的花仙子更要强得多。我想这不是作者有意追求一种稚拙的美，他只是照生活这样写生活。作品的形式就是生活的形式。天生浑成，并非反朴。”又夸赞曹乃谦的语言道：“语言很好。好处在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。”最后，汪曾祺指出，曹乃谦应该格局大一些，他说：“写两年吧，以后得换换别样的题材，别样的写法。”

汪曾祺对《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》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，但也指出了曹乃谦的问题，曹若想突破，可从此处着手。

时间的意义

汪曾祺的故里小说中，《八千岁》不算特别显眼。它不像《受戒》（1980）、《大淖记事》（1981）那样有“破界”的意义，逮至1983年《人民文学》第2期发表《八千岁》，汪曾祺关于高邮的小说已经层叠叠出，《岁寒三友》《故乡人》《徙》《王四海的黄昏》《故里杂记》《鉴赏家》《晚饭花》，连他20世纪40年代代高邮的《鸡鸣名家》也已重新面世。接着《八千岁》发表，还有众口称赞的《故里三陈》（尤其是《陈小手》）。《八千岁》在汪曾祺这一“高邮序列”里，似乎只是大运河中一朵浪花。

尤其是《八千岁》的题材，只是写一个吝啬的商人被当地驻军敲诈，既非抒写劳动人民的“精神美”、“人情美”，也不代表“最后一个土大夫”的文人雅趣。在当年，《八千岁》可以说将《受戒》引出的“汪曾祺之问”——“小说可不可以没有意义”推到了极致。似乎也正是因此，少有评论文章单独讨论《八千岁》，多是将它放在一连串的汪曾祺高邮小说中，说是书写了“小人物的悲欢”。

30年后回看《八千岁》，它的特别之处正在于超越了读者熟悉的劳动者、文人这两个汪曾祺笔下常见的群体，展现了小城高邮更多的社会层面与生活场域。如果我们将汪曾祺看作一个为高邮作传的写者，《八千岁》以其人物之丰富、描写之凝练，堪称进入“汪曾祺的高邮”的一把钥匙。与汪曾祺其他高邮小说相较，《八千岁》的时间比较明晰，八舅太爷进入里下河地区是“抗战军兴”之后，而这一带呈现出畸形的繁荣，是在“八一三”之后，日本人打到扬州，就停下来，暂时不再北进，扬州沦陷，是1937年12月14日，而高邮被日军占领，是1939年10月2日，而汪曾祺在这年夏天离开高邮经上海、香港往昆明考西南联大。《八千岁》的主要故事，就发生在1938年初至1939年上半年这一时段。

这一时段，念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为避战乱，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、私立扬州中学、盐城临时中学，1938年还随祖父、父亲到高邮北乡庵赵庄住了半年——这里正是《受戒》故事的发生地，可是从《受戒》中我们完全看不出战乱的背景。时间明晰的意义，在于它决定了文本的方向。《受戒》的末尾注明“写43年前的一个梦”，这个梦是没有确切时间，它可以发生在汪曾祺高邮1919年生涯的任何一个时段。甚至在那之前、之后，也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只要庵赵庄没有改成人民公社，善因寺没有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明海与小英子的故事就会一次又一次地上演（善因寺方丈石桥的原型叫铁桥，此人在高邮沦陷后投靠日本人，那时汪曾祺已在高邮，可即使《受戒》的故事放到那时，又有什么不同？）《大淖记事》犹如一幅里下河的风俗画，而这一幅画也是长时段的，锡匠与挑夫，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，小说结尾，巧云也挑起担子，十一岁伤好了还是锡匠，刘号长被赶走了，水上保安队依然存在。日子似乎会永远地这样过去。但《八千岁》不一样，这篇小说写的是“变”。前半篇的“不变”，映衬着后半篇的“变”。在《八千岁》中，汪曾祺的高邮不再是一个梦，或一幅风俗长卷，视线所及，满纸都是大堤将决前的波荡。

八千岁

《八千岁》的开头算得奇崛：“据陈存仁记载，1914年的上海米价，每担3.6元，1929年，高邮米价每担6元（大旱大涝灾害时曾涨至一担24元），抗战前夕，江南米价只有5元一担（丰子恺《伍圆的话》）。在八千岁发迹的这一时期，八吊钱连一担米都买不到，而八千岁能以此贩卖米起家（不熟不做，他应该别无他业），靠的什么？一靠胆量，二靠不变。”所谓“不变”，首先是米价，“早晚市价，相差无几，十多年来，也不过从3.6元涨到了五六元。”卖稻的客人知道八千岁在这上头很精，并不跟他多磨嘴”，自然，卖米的利润也是固定的，而且做的是街坊生意，“买米的都是熟人，买什么米，一次买多少，他都清楚”。其次是他的生产方式，“这两年，大部分米店都已经不用碾子，改用机器轧米了，八千岁却还用这种古典的方法生产”，机器轧米的革新还不曾影响到八千岁的生财之道，因为“本县也还有些人家不爱吃机器轧的米，说是不香，有人家专门上八千岁家来买的，他的生意不坏”。托庇这相对安稳的时世，八千岁才能一点一点靠着“不变”积攒起他的财富。

八舅太爷这样的人最适应乱世，聪明、胆大，不安分，而且无赖不讲理，“八舅太爷”这个绰号就是这么来的，因为高邮人“把不讲理的人叫做‘舅舅’，讲一种胡搅蛮缠的歪理，叫做‘讲舅舅理’”。如果没有战乱，八舅太爷多半在上海当他的白相人，“放浪形骸，无所不至”。即使混进了军队，也未必能公开地鱼肉乡里。然而抗战军兴，和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主任任冷欣、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都能拉上关系的八舅太爷，就成了里下河几县轮流转，说一不二的“霸王”，骂一声“汉奸”，就可以拉一个人出去军法从事，“城里和乡下的狗一见他的车队来了，赶紧夹着尾巴躲开”。

汪曾祺对这段时间高邮社会的描述极为准确而精彩：“八一三”以后，日本人打到扬州，就停下来，暂时不再北进。日本人不来，“国军”自然不会反攻，这局面竟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。起初人心惶惶，一夕数惊，到后来大家有点麻木了；竟好像不知道有日本兵就在一二百里之外这件事，大家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。种田的种田，做生意的做生意，江界为江，南北货源虽不那么畅通，很多人还可以通过封锁线走私贩运，虽然担点风险，获利却倍于以前。一时间，几个县竟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，茶馆、酒馆、赌场、妓院，无不生意兴隆。”

非常时期，军事第一，八舅太爷俨然成了本地的“最高军政长官，县长、区长”。最妙的是，“当地人觉得有一支军队驻着，可以壮壮胆，军队不走，就说明日本人不会来，也似乎心甘情愿地孝敬他”。高邮社会的规则已经变换，锡匠们“顶香请愿”，虽然不见于《六法全书》，但县长不愿把他们逼急，会邀请县里的绅商商议，通过协商了解十一子与刘号子的恩怨。而在战时，军队领袖的统治合法性至高无上，八千岁这样的富商自然无法与抗。八舅太爷在汪曾祺小说里还出场过一回，那是1992年创作的《鲍团长》。鲍团长是保安团的团长，在国民革命军里当过营长。八舅太爷闹得实在不像话，商会会长王蕴之请鲍团长出来，以军伍前輩的身份规劝八舅太爷。哪知名片递进去，回话时说：“旅长说：‘不见！’”鲍团长自觉愧对乡亲父老，这成为他去职的原因之一。

政权、绅商、行伍伦理，八舅太爷一概不顾，偏偏他还自称“戎马人生”、“富贵英雄美丈夫”，占了宋侉子的踢球乌骓，画一张画当谢礼。这样一个“风雅”的兵痞流氓，倒也是小说中民国人物形象的创格。

小城中的商人、小手工业者，受到的迫害往往来自军队与流寇。《岁寒三友》中，王瘦吾毁于流寇，商人王伯韬之手（流氓商人的穿着很特别：“不论什么时候，长衫里面的小褂的袖子总翻出很长的一截。料子也是老实商人所不用的。夏天是格子纺，冬天是法兰绒。脚底下是黑丝袜，方口的黑纹皮面的硬底便鞋。”），陶虎臣的炮仗店，一败于当地驻军严防期间燃放鞭炮，二败于蒋介石的“新生活运动”（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全民军事化运动），最后连女儿也卖给了一个驻军连长，倍受欺凌。军队与流寇，都是民国社会中的“变数”。传统社会依靠官绅共治，以此达成社会的稳定，而军队与流寇是或明或暗的破坏力量。一旦像八舅太爷那样，将军队与流寇结合起来，又恰逢乱世，便几乎可以摧毁一切人们熟知的伦理规则。

边缘人

在汪曾祺的高邮世界里，社会下层有他们的委屈、辛酸与悲苦。但他们可以仗自己的努力寻求希望与出路，巧云与十一子的相恋、《异秉》里的陈相公有梦里与母亲对话的慰藉，“岁寒三友”都

靠技艺与变革迎来好运，八千岁更是全凭俭省起家。他们各有特色，但合在一起，构成了其乐融融、有板有眼的人间。然而新的破坏力量自外而来，不仅是流氓、军队这些有形的力量，还有时代的变动那种“惆怅的威胁”（张爱玲）。

八千岁古并不波的生活里，偶尔也会有所触动。看小千岁玩鸽子，他也觉得有趣。看见“长得像一颗水蜜桃”的虞小兰，他也会想：“长得是真好看，难怪宋侉子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钱。不过为一个姑娘花那么多钱，这值得吗？”结论且不说，八千岁肯定觉得想想这个问题，都能把自己吓一跳！所以“他赶快迈动他的大脚，一气跑回来”。

八舅太爷一来，八千岁生活里的很多规则都守不住了。他往仙女庙贩粮，却不肯事前花钱运动。这种做法以前行，现在不行，立即被扣上了“资敌”的罪名。宋侉子是他这辈子惟一信得过的朋友，肯帮忙。宋侉子叫他拿100块钱送给虞芝兰，讲好800大洋赎人，又“说了好多好话”，才请到两个同行出面做保，将八千岁保了出来。

八千岁给自己和小千岁换上了蓝阴丹土林的长袍，刮去了“概不做保”与“僧道无缘”两道字条。跟着就是那句点睛之笔：

“是晚茶的时候，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饼来，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，大声说：

‘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！’”

结尾的况味，与老舍《断魂枪》结末沙子龙抚摸着冰凉的枪杆，说的那句“不传，不传”有异曲同工之意。一个时代的逝去，不是升斗小民所能看清，但他们能够清晰感觉那种动荡。

这种动荡，在有些语境里，或许还是一种进步或革新的象征。但在汪曾祺的高邮世界里，那些手艺高超的匠人，那些安分守己的坐商，甚或只凭力气吃饭的贫民，都被这种动荡剥夺了按照自己意愿或常例生活的权利。

丛刊2013年第6期目录

第三届王瑶学术奖评语	
孙犁诞辰一百周年	
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孙犁	张 莉
《风云初记》与孙犁小说的审美残缺	闫 红·毕绪龙
作家与作品	
论顾毓琇的文学创作	杨 义
重读《新的信念》与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	程 凯
弃仇者的选择与承担	
——读沈从文的《渔》与汪曾祺的《复仇》	张露晨
《看虹录》：“用人心人事作曲”的实践	李雪梅
刹那见永恒——从书信往来看王国维最后十年的心路历程	刘克敌
论经济因素对王鲁彦乡土小说叙事的影响	周春英
论《家变》的文学史意义	方 忠
从王朔小说看“大院北京”	
——现实与文本中的文化空间	郑以然</